

# 文本·历史·颠覆·协商

## ——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析《愤怒的葡萄》

黄丽清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州 350108)

**摘 要:**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入手,以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萧条为历史背景,解析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如何体现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抑制并颠覆“西部观念”和“美国梦”;参与“沙尘暴移民”激进话语的商讨与交流;参与历史意义的发展与建构。从《愤怒的葡萄》与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可以证明该小说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史诗”,斯坦贝克是一位具有伟大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

**关键词:**《愤怒的葡萄》;颠覆与抑制;商讨与交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634(2015)01-0094-05

### Text, History, Subversion, Negotiation: Interpreting *The Grapes of Wr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HUANG Li-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flection of New Historicism in John Steinbeck's masterpiece *The Grapes of Wrath*. Se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30s, *The Grapes of Wrath* illustr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and history, subversion and containment of "Western Concept" and "American Dream",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Dust-bowl Migration", as well a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us, it can be proved that this novel was a great epic and John Steinbeck was a great writer with humanistic compassion.

**Key words:** *The Grapes of Wrath*; subversion and containment; negot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 一、历史与文本

1982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蒂芬·格林布拉格在《文类》(Genre)杂志上首创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向“在艺术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之间作截然划分的假设”发起了挑战<sup>[1]</sup>,主张将文学文本(text)与历史语境(context)相联系,将文学作品纳入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阐释;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是特定历史、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文本本身即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参与历史的建构并对历史的塑造发挥能动作用。艺术家的创作必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其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矛盾现象。文学批评的作用在于通过对文本的历史情景进行解读,把文本置入多种多样的、复杂的文化之中,对主流话语权

收稿日期:2014-10-16

作者简介:黄丽清(1978—),女,福建闽侯人,讲师,硕士。

力运作的复杂关系进行揭示,从而生动地再现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语境。

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漫长的大萧条,使得失业与贫困成为最迫切的社会问题。1929年10月24日(即所谓的“黑色星期四”),经济危机首先爆发于证券市场,使之完全陷入恐慌中。随后美国陷入工业与金融停滞的深渊。全美范围内出现了持续的经济混乱,大范围的失业,等待救济品的队伍政治动荡,以及社会冲突。所有这一切都进一步击碎了公众的美国梦。而背井离乡的西行运动更是美国梦的破灭。美国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之深刻,恐怕只能与建国初期的独立战争和内战相比拟。

大萧条的社会影响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大农场主和大公司从罗斯福新政和《农业调整法》中受益,广大的普通农民则被银行支持下的大规模生产逼到了绝境,纷纷离乡背井,西去寻找生路。广大农民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是走到前台,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现实唤醒了作家的良知。30年代的美国作家将笔触转向人人关心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成了人民的喉舌。揭露社会的不平与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成为最常见的主题。斯坦贝克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对贫苦农民所遭受的苦痛感同身受,以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份进行小说创作。

1937年秋,斯坦贝克跟随俄克拉荷马州农民的西迁队伍,亲身体验了农民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创作了《愤怒的葡萄》。小说以经济大恐慌时期大批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是一部描写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大批破产农民向加利福尼亚逃亡的动人史诗。小说以其巨大的真实性而深受好评。斯坦贝克用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广大破产农民的苦难,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血泪、愤怒以及抗争。斯坦贝克寄予底层人民以同情,深刻剖析了造成人民生存灾难的原因,为后世留下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状况和不公正现实的真实记录,留下了一份美国人民开发新大陆的艰难经历和勇敢精神的缩影。在小说中,斯坦贝克建构了大萧条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赋予作品一种深刻的时代忧患意识和厚重的历史感。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及“文化诗学”时曾倡导“小历史观”,即一种进入社会边缘生活层面的历史阐释。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曾言:“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言语再现那些被掩埋的话语,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他们重述了什么,取决于他们用新的言语重述大量被掩盖的话语。”<sup>[2]</sup>在《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展现的并非“通识家”描述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横向发展的“大历史”,而是作为普通人的乔德一家的“小历史”。这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边缘性创作策略,即通过描述被忽略、被压抑的边缘声音,实现对中心话语的挑战、质疑和批判。

乔德一家的遭遇是当时广大劳苦大众共同遭遇的体现。在30年代的美国,背井离乡、西去加州谋生的不只乔德一家,而是千家万户,几乎整个美国都在向西运动。从这层意义上讲,乔德一家的遭遇就不再是一家的遭遇或一家的私事,而变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变成了美国的一段历史。《愤怒的葡萄》也就变成了一部伟大的社会文献。它是美国30年代广大劳动人民受苦受难和英勇斗争的忠实记录,也是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大农场主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压榨的历史见证。有些评论家认为,斯坦贝克的这部小说比任何一部和它同时代的作品更忠实地代表了那个愤怒时代的特征。斯坦贝克代表底层劳动人民发出了那个时代的呼声,当之无愧地成为大萧条时代的文化代言人。

## 二、颠覆与抑制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一种颠覆与抑制的关系。处在由于社会能量的协合运作而交织起来的巨大的社会文化网络中的文学艺术,不可避免地深受这种社会现象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颠覆与抑制功能。简而言之,“颠覆”体现在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抑制”则是对颠覆性力量的反叛;二者形成一个悖论,而文学作品就在这看似相悖的境况下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以积极的态度介入现实,对社会发生影响。

在《愤怒的葡萄》的叙事模式中,斯坦贝克借用了《旧约·出埃及记》这一神话模式。古以色列人在先知摩西的带领下,一路饱经磨难和考验,终于到达“上帝赐予的福地”——“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圣地。

对于作为清教移民后裔的美国人而言,西部是理想的福地、自由的疆土,承载民族使命的精神寄托。从美国建国伊始,在美国民族的意识里一直怀有新伊甸园就在西边的美好愿望。但是,《愤怒的葡萄》展示的却是充满艰难困苦与骚动不安的加州之旅。作为移民的代表和缩影,乔德一家向西行,希望找到美好的“希望之乡”。但是,乔德一家的西行之旅遭遇的却是苦难、压迫和梦想的破灭,完全颠覆了“寻找新伊甸园”的美国神话。但是,斯坦贝克对此处的颠覆进行了抑制,因为《愤怒的葡萄》的叙事结构本身就取材于《圣经》这一养育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性作品,而不是源于西方以外的任何神话模式。斯坦贝克通过这种叙事结构和创作模式清楚地表达了对当时移民问题的看法:在美国之内解决美国的问题。

作为移民的代表,乔德一家西行的苦难历程预示着颠覆,甚至是革命。但作者并不倡导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并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斯坦贝克向读者暗示的是一场爆发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意识的转变和思想革命。沃伦·弗兰契曾评论道:“《愤怒的葡萄》不是讲一个家庭寻求生活保障的经历,它讲的是一个心灵的教育过程。”<sup>[3]</sup>小说在激起人们对反动保守势力产生反感的同时,又保留了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因此,颠覆并未完全主宰着小说。在斯坦贝克看来,推翻压迫并不意味着非得进行颠覆性的革命。在《愤怒的葡萄》中,斯坦贝克建构了一个将所有的人都团结起来的人类大家庭,它可以消弭、化解人类的各种仇恨。对人类美好未来的这种构想暗示了作者的一个信条,正如小说中所写的:

你可以这样来谈论人,当各种理论发生变化、支离破碎时,当各种学派、哲学以及狭隘而黑暗的民族、宗教和经济思想由发展转而分解时,人总还是前进着,他痛苦地,有时是错误地蹒跚着前进。人向前迈出了步子,也许还会后退,但只会后退半步,决不会后退一整步。

这一信条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是斯坦贝克余生小说创作的基础。

“美国梦”贯穿美国文学史的始终。在《愤怒的葡萄》中,乔德一家对“美国梦”的追求转化为对“土地梦”的憧憬和向往。然而,由于人们的贪欲,土地仅仅成为发财致富的工具和商品。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的“金钱梦”取代了“土地梦”,并由此腐蚀了“美国梦”。最终,被自私的占有欲和对金钱的贪欲所驱使的农民,对大平原上的土地进行了毁灭性的掠夺,引发了大平原上良田尽毁、沙尘蔽日的生态灾难。在小说中,斯坦贝克对“美国梦”中物质主义至上的消极价值观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只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没有精神支撑的美国梦不是一个完美的梦想”<sup>[4]231</sup>;缺乏对土地敬畏与感恩之情的“土地梦”注定要破灭。斯坦贝克在此基础上批判并颠覆了“美国梦”。

小说的第三、四章还批判和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美国人——包括美国政府、唯利是图的农业资本家,以及像乔德一家这样的农业工人,对土地开始了掠夺式开发。20世纪初,加入了一战的美国为了满足战争的进行需要种植大量的棉花和小麦。“华盛顿发出了一个爱国的,预示小麦高价格的呼吁:‘种更多的小麦!小麦会赢得战争!’”<sup>[5]113</sup>正是在这种贪欲的驱使下,美国人用近乎暴力的手段对土地进行压榨——“我们要趁着这块地还没有完蛋之前,赶快种出棉花来。然后我们就把地卖掉。”由于农民大量种植小麦和棉花,“把土地弄坏了,吸干了地里的血。”<sup>[4]35-36</sup>最终,土地被滥垦,土壤迅速沙化,从而造成上万亩农田顷刻被毁,乔德和千千万万农业工人不得不举家西迁。

### 三、谈判与协商

新历史主义强调艺术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的“谈判”、“交易”和“协商”,主张两者之间构成相互渗透、相互穿插、循环往复的结构关系。文学作品在两者的商讨与交流之中得以实现。因此,文学批评要拆除真实的历史与审美的文学之间的藩篱,再现并倡导社会话语与艺术话语之间“谈判”和“交易”的过程。一方面文学批评一定要“历史化”,要将文学放入一个大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另一方面,它也在尝试将历史“文学化”。

《愤怒的葡萄》出版后,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小说成功的原因在于,它参与了一种表征美国南部“沙尘暴移民”的激进主义话语的商讨与交流。19世纪80年代,为了满足迅速膨胀人口的粮食需求,美国政府开始引进大型机械大面积开垦被诗人惠特曼称为“北美的典型景观”的南部大平原,采取工业化生产和商业化运作,以期从土地上获取最大利润;美国政府还鼓励农民和农场主积极种

植棉花,以期获得巨额利润和建立“金元帝国”。正是在这种疯狂贪欲的驱使下,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大平原上的农民和农场主们用近乎暴力的手段对土地进行压榨。土地被当作人类获取利益的商品,脆弱的生态系统随之遭受破坏,曾经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最终蜕变成沙尘漫天的荒原。经过五十多年的演变,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爆发了一场旷世不遇的生态灾难。这场沙尘暴毁掉了堪萨斯、俄克拉荷马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大部分农田,共计500万英亩庄稼被吹光。乔德和千万农民的“土地梦”也旋即破灭。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对沙尘暴的根源作过两段精辟的评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sup>[5]114</sup>“我们谈论大平原的农场主和耕作以及他们所造成的危害,但这远远不够。把他们引到这地方来的,是一种社会制度,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经济体系。没有一个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可以充分地概括这些因素了。”<sup>[5]4</sup>在第二段评论中,唐纳德·沃斯特关注的是资本主义这种复杂的经济文化所教导的生态价值观,即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择手段地从被当作资本的自然中谋取最大的利润。而这正是南部大平原沙尘暴产生的根本原因。

作为有着深刻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斯坦贝克搜集了关于沙尘暴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愤怒的葡萄》中真实地表现了这场生态灾难。在小说中,斯坦贝克敏锐地把握住了引发沙尘暴的根源——沙尘暴地区农业经济生产体系。从小说的描写背景可以看出,沙尘暴不仅是天灾,更是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物。

《愤怒的葡萄》的出版加速了社会各界的觉醒,也促进美国政府加强对沙尘暴的治理。美国政府认识到,要治理沙尘暴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约束。最明显的举措体现在1936年3月1日,当时的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水土保持和家畜分配法》。该法案旨在对农场主种植保护土壤且产量不过剩的农作物提供经济支持;并针对严重的水土流失情况,倡导水土保持和科学耕作以利生产<sup>[6]</sup>。罗斯福政府用必要的经济利益引导农场主们从事资源保护活动,各种民间力量也纷纷投入到沙尘暴的治理中来。后来,地下水灌溉被广泛采用,沙尘暴得到明显抑制。

正是通过参与“沙尘暴”的话语实践,斯坦贝克创作了惊世骇俗的《愤怒的葡萄》,其伪纪实性风格与政治上的直接性使之成为大萧条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献,作品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斯坦贝克曾经说过:“我只是将我们大部分人所做所想的东西记录了下来”。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当时美国一部最具政治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形态的物质产品,而且是该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作者通过“沙尘暴移民”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表达了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批判,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所坚持的艺术作品与社会话语的“谈判”、“交易”与“协商”。

#### 四、还原与建构

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有预见的文学文本能够参与历史的发展与建构。《愤怒的葡萄》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形成了互动关系,参与到大迁徙移民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甚至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运作和等级秩序的重新审理。

1939年,当《愤怒的葡萄》在美国出版问世时,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波浪,引起极大的社会轰动。斯坦贝克的支持者包括政府部长、大学教授、社会学家以及其他有关人士。他们欢呼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巨著的诞生,把小说与废奴运动时期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提并论,认为约翰·斯坦贝克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为现代奴隶大声疾呼并伸张正义。国会还派出了调查团,调查结果表明实际情况比小说中描写的更糟糕。这部作品迫使国会立法,资助迁居的农场工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当时的进步评论界分别给予小说和小说家很高的评价:认为该小说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就,是20世纪美国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美国30年代伟大的社会文献;而斯坦贝克则是第一流的社会小说家,同时也是最反映他那个时代下层阶级悲惨生活的作家。在一篇纪念《愤怒的葡萄》发表50周年的文章中,威廉·肯尼迪说:“在我看来,这部小说也是对近50年来美国的无家可归者的生动写照,它描写的是处在世界最底层的人们,即那些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一无所有,四处飘泊的流浪者。‘我活不下去了,我还得活下去’。”

但是,由于斯坦贝克揭示的社会问题十分尖锐,小说一发表就招致了很多言辞激烈的负面批评,尤其遭到了来自俄克拉荷马和加利福尼亚有关人士的批评<sup>[7]</sup>。俄克拉荷马州的人们说斯坦贝克在他的小说中所描绘的那幅图画是该死的谎言,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才会写出这种可恨的作品。当时在加州出现了好几种小册子,试图证明斯坦贝克书中所描写的情形纯属捏造,而作者的意图则是想利用苏联的社会制度取代美国的社会制度。还有人写了《斯坦贝克和移民的真相》以及内容与之针锋相对的《快乐的葡萄》等书籍来抵制《愤怒的葡萄》的影响。小说的出版更是引起了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他们操纵的宣传机构千方百计地抹煞小说和作者的成就;攻击小说是“出自怪癖变态头脑中的无耻恶毒的捏造”;竭力诋毁作者是在为共产主义作宣传。该书甚至在国会遭到恶毒攻击。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以斯坦贝克是“共党分子”和“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利益的犹太人”为由要对其进行调查。该书在街头被焚,在学校和图书馆遭禁,借口是书中有露骨的性描写。

从美国社会和评论界对斯坦贝克及其《愤怒的葡萄》毁誉参半的评价和各种不同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斯坦贝克参与了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进程的发展与建构、权力交替和等级秩序的建立,同时也展现了斯坦贝克的新历史主义思想。无论是文学对历史的阐释还是在历史中阐释文学,都体现了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文学并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文本对历史的重构施加影响。斯坦贝克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对现实建构合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文学批评的作用在于发掘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话语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将文本的历史本质还原出来。

要而言之,20 世纪 30 年代是美国左翼文学的黄金时代。作家亲自置身于政治运动之中,并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实现社会变革,因此揭露和抗议社会弊端的小说层出不穷。但是,没有哪一部作品像《愤怒的葡萄》那样为大众争相阅读,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斯坦贝克向世界揭示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经济危机造成的人口大迁徙运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文学与历史的互动。斯坦贝克曾言:“作家有义务揭示我们中间存在的许多严重错误与失败,将黑色、危险的梦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社会能取得进步。这是作家的责任,以前如此,今天也没有变。”这是直到 1962 年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仍然坚信的“作家的责任”。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仪式上,斯坦贝克再一次向世界宣称了他对人类的信念:“我以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满怀激情地相信人是可以不断完善的,那么他就不可能对文学事业鞠躬尽瘁,也没有资格成为文学领域中的一员。”<sup>[8]</sup>通过描写困苦和艰难如何净化人的灵魂,使人际关系美好,《愤怒的葡萄》证明了斯坦贝克对人类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坚定信念。

## 参考文献:

- [1] 格林布拉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威力》介绍[C]//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601.
- [2] William J. Palmer. Dickens and New Historicism[M].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138.
- [3] French, Warren. John Steinbeck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1975:94.
- [4] 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M].胡仲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5] 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 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M].侯文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6] Edgar B Nixon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Conservation, 1911—1945[M]. Massachusetts: Literary Licensing LLC,1957: 490—493.
- [7] Martin Staples Shockley. The Reception of The Grapes of Wrath in Oklahoma[M].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15.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44:351—361.
- [8] Steinbeck John. The Grapes of Wrath[M]. New York:Bantam Books, Inc. 1966:93.

(责任编辑 蒋涛涌)